

聖保祿六世對現代教會及 現代化世界的影響

林瑞琪

當前普世教會熱烈準備世界主教會議的討論及諮詢工作，令筆者特別想起聖保祿六世。1965年9月14日，梵二會議進入總結階段之際，聖教宗保祿六世毅然宣佈確立世界主教會議為普世教會常設組織，定期舉行會議，以作為教宗的重要諮詢機構；沒有這一創舉，就不會有今天我們大家都努力為主教會提出意見的機會。

教宗保祿六世本名蒙坦尼（Giovanni Battista Enrico Antonio Maria Montini），1897年生於意大利布雷西亞，1920年晉鐸，1954年晉牧，並出任米蘭總教區總主教。

蒙坦尼總主教的聲望，早就在許多天主教領袖的心目中留下印象；根據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生平而拍成的一套電影中提到，當1958年秋季教宗庇護十二世逝世，全球樞機雲集羅馬準備選舉新教宗，後來當選為若望二十三世的龍嘉諾樞機，就曾向友輩樞機表示考慮推舉當時尚未成為樞機的蒙坦尼出任教宗。而按《歷代教宗簡史》一書所載，蒙坦尼總主教在選舉教宗的機密會議上，的確也得到多人投票。及至若望二十三世出任教宗不久，隨即擢昇這位蒙坦尼總主教為樞機；而這位新樞機也在五年後亦眾望所歸而當選為教宗保祿六世。

聖保祿六世對梵二大公會議的重大貢獻

教宗保祿六世於 2018 年 10 月 14 日由現任教宗宣佈列入聖品。聖教宗保祿六世繼承了他的前任聖若望二十三世多項重要改革，包括繼續進行後者所召開的梵二會議；兩人的革新精神，可說是二而為一的，以至隨後的兩任教宗，在當選時都取雙重名號分別稱為「若望保祿」一世及二世。聖教宗保祿六世在梵二會議廣開言路，包括邀請平信徒出任觀察員；當中香港教區的熱心教友陳佐舜博士，即獲邀成為亞洲兩位教友代表之一。（另一位代表來自印度。）

教宗保祿六世的開明作風，引起教會內一些偏重傳統的神長感到憂慮，當中最令他們不能接受的是梵二《禮儀憲章》所提出的禮儀語言改革，即開放以拉丁文為本的禮儀語言限制，而容許各個地方教會採用當地人民通用的本國語文。當時甚至有不少神長，為抵制這項禮儀改革而退出神職人員的行列。

然而，在《禮儀憲章》頒行及落實半個世紀之後的今天，當我們回顧這一重大革新時，實在忍不住要深深的感謝教宗保祿六世的勇氣及前瞻，為我們帶來一個與現代社會同行的天主教會。

教宗保祿六世同時也充份重視基督宗教內的合一使命，同時更進一步提出不同宗教應促進溝通及合作；更進一步的是，他以劃時代的先知眼光，提出與無神論思想進行廣泛交談。梵二會議閉幕後不久，教廷先後成立「宗座促進基督徒合一委員會」、「宗座宗教交談委員會」及「與無信仰者交談秘書處」；讓不同宗教觀及信念的全球人士，有機會面對面坦誠地交流，並促進合作；這樣一來，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並消除了不少往昔的誤解。

聖保祿六世帶領現代教會國際化

教宗保祿六世既承先啟後，又獨具慧眼別開坦途。筆者在 2018 年 9 月 17 日見於《公教報》題為「聖教宗保祿六世精於用人濟世無限」的文章，列舉了保祿六世用人的精彩之處。以下逐一為讀者簡述。

1977 年當教宗保祿六世任命羅慕洛神父為薩爾瓦多總主教時，當地以至於不少其他地方的天主教推動社會運動人士，都對此任命表示不滿，認為教宗特意選擇一位低調怕事的神職人士擔任總主教，是向右派極權政府低頭；結果歷史證明羅慕洛總主教是最理想人選，亦為薩爾瓦多帶來新氣象。

1969 年，教宗保祿六世任命了年僅 46 歲，完全在普世教會上寂寂無聞的首爾總主教區（當時的中文名稱是「漢城總教區」）金壽煥總主教為樞機；當時連韓國天主教徒也意想不到。

金壽煥樞機完全是保祿六世一手提攜的新人；僅僅在三年的 1966 年尚只是金壽煥神父的時候，保祿六世挑選了 43 歲的他出任馬山教區主教，兩年之後，保祿六世親自拔昇他為首爾總主教，之後一年就是歷史性的擢升樞機。

日後的金壽煥樞機，成了韓國民主運動的主要保護者，在韓國民主化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獲得教會內外以至全國人民及普世人士的愛戴。

1967 年 6 月 20 日，保祿六世也出人意表地任命波蘭克拉科夫總教區年僅 47 歲的華迪偉（Karol Wojtyla）總主教為樞機；這位年輕的樞機，11 年後即成為年輕的教宗，世界偉人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保祿六世的另一讓人佩服不已的選擇，造福了亞洲唯一以天主教徒佔多數的國家——菲律賓。1967 年，教宗保祿六世任命年僅 39 歲的辛海綿神父（Jaime Sin）為雅羅教區（Diocese of Jaro）輔理主教，到 1972 年接任為雅羅教區總主教，兩年後接任馬尼拉總教區總主教；再過兩年的 1976 年，年僅 48 歲的辛海綿總主教就獲晉陞為樞機。在面對馬可斯獨裁政權之下，辛海綿樞機全力維護了社會人民及公民權利，支持及參與了「人民力量革命」，最終推翻了馬可斯政權；並鞏固了菲律賓的民主體制。

1977 年 5 月 28 日，教宗保祿六世任命了年僅 50 歲的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神父為慕尼黑及弗賴辛（Munich and Freising）總主教，隨即在 6 月 27 日晉昇拉辛格總主教為樞機；拉辛格樞機在 5 年後獲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委為信理部部長，2005 年更當選教宗，成為教宗本篤十六世。

即將列入真福品的教宗若望保祿一世也是由聖保祿六世教宗任命為樞機進而當選成為繼任的教宗；儘管新教宗在任三十三天就逝世了，卻以很親切的微笑在世人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當選為教宗，亦可反映聖保祿六世的獨到眼光。

聖保祿六世對香港教區的特別關懷

1968 年，保祿六世別出心裁地任命了年僅 53 歲徐誠斌神父為香港教區主教；徐主教以其後短短的五年生命，為香港教區奠定深厚的基礎；而徐主教在社會事務上的參與，包括調解教師罷課及爭取擱置執行死刑，都彰顯了重要是天主教社會公義精神。徐主教與亞洲各地的天主教領袖努力之下，促成了「亞洲主教團協

會」(FABC)的成立；又於 1970 年邀請到教宗保祿六世訪問香港，可見教宗保祿六世對徐誠斌主教的器重。

1974 年，保祿六世任命了李宏基輔理主教接掌香港教區，可惜僅歷十個月就逝世了。1975 年，保祿六世又出人意外地任命胡振中神父為香港教區主教，胡樞機領導了香港教區 27 年，是令人常常懷念不得的長者。

聖保祿六世對現代世界影響深遠

教宗保祿六世對現代世界的貢獻甚多，不容易以三數頁紙而詳細交代。筆者僅引用他的「世界和平」呼籲及《民族發展》通諭以資說明。教宗保祿六世於 1965 年 10 月遠赴美國紐約，造訪聯合國大會，並發表於日後廣受人引述的名言：

不再有戰爭，永不再有！和平，只有和平有能力導引人們及所有人類的命運。(No more war, never again war. Peace, it is peace that must guide the destinies of people and of all mankind.)

教宗保祿六世訪問聯合國之際，正值美國積極介入的越南戰爭愈演愈烈之時，教宗的肺腑良言並沒有改變當時統治者的任何決定。然而，當我們看到越戰結束至今的五十多年之後，目睹當年的交戰國美國及越南竟能成為貿易上及國際事務上的積極夥伴，不禁要嘆息當年的戰爭全無必要，當年的死難者亦實在犧牲得很無辜。目前實況也回應了教宗保祿六世所說的；只有和平有能力導引人們及所有人類的命運。

教宗保祿六世在 1967 年發表的《民族發展》通諭，最能反映教宗對現代世界的關懷。教宗保祿六世提出，「發展不是簡單地歸結到經濟的進步而已。確實的發展該是全面的，即振興全體人類，即振興整個人性。誠如一位卓越的專家很恰當地強調說：我們不能接受經濟與人性分離，『發展』與其所屬文化分離，我們所注重的是人，每一個人，每一班人，直到整個人類。」（《民族發展》#14）

教宗保祿六世提醒我們：增加財富並非一個民族的終極目的，他寫道：「一切的發展有雙重效果。一方面，為使人更富有人性，「發展」是必需的；但另一方面，「發展」能阻止人看到物質以外的事理，而把物質看成最高目標，它便把人限制起來，如同關在牢獄裡一樣了。那末，人心變壞，精神蔽塞，人不再以友誼而結合，卻以利益而同謀，一有利害衝突，便將互相對立，彼此拆夥。因此，單求物質利益，不但阻礙人性發展，而且反對人性的真正偉大。因為無論為國家，或者為個人，慳吝是道德落後最明顯的標識。」（《民族發展》#19）

教宗保祿六世以《創世紀》1 章，28 節所說的「充滿大地治理大地」一句，鼓勵我們，「全部創造工程是為了人類，要人負責應用理智的力量，使它發生實用的價值，並用勞力完成它給人使用的目的。如果土地是為供給每個人維持生活之必需，和發展自己之工具，則每個人都有從土地獲得生活必需的權利。梵二大公會議提示說：「天主命定土地及其包羅的一切，都是為各民族的每個人使用的，受造的物資，應依照與仁愛不能分離的正義準則，公平地流入每個人的手中。」（*Gaudium et Spes*）一切其他任何權利，包括私產權和自由貿易權，都隸屬於這條自然法律，其他權利不應妨害，反而應有助於這條自然法的實施。引導一切

權利合於它們的第一目標，是一種嚴重而迫切的社會責任。」
（《民族發展》#22）

教宗保祿六世提出「一切為增產所擬定的計劃，不應有其他確定的理由，只應為人服務而已。那就是消除不平等，克制優越感，解放奴役中的人們，使他們在物質條件上、道德進修上、精神發揮上，都能自主，並為自己能向更好方面負責主動。說到發展，那就該致意於社會和經濟並行的進步，僅僅增長財富，得以公平分配是不夠的；僅僅推進技術，使土地更適合於人居住也是不夠的。正在發展途上的國家，鑒於以往的錯誤，當自知警惕，以免重蹈前車覆轍。將來的技術管理論（主張根據工藝專家及工程師之調查報告以統制工業資源及改革社會體系），會產生比以往的自由主義，所造成的更為可怕的災禍。經濟、技術，除了為人服務以外，不應有甚麼其他意義。人，祇在行動上能自主，且能判斷自己行動的價值時，才真是人，他依照造物主賦與他的本性，由本性自由地取擇可能和必需，這樣，才算他自己是自己進步的主動。」（《民族發展》#34）

教宗保祿六世特別提出「種族歧視」的為害極大，這問題到現今世界依然為許多民族帶來痛苦。教宗說，「殖民時期，在移民和土著之間常有虐待情事，阻礙交換豐富知識，跟著切實的不公不義，惹起許多怨恨。種族歧視，為落後國家間的合作，是一個阻礙；又因為人性不可消滅的權利受到蔑視，個人和家庭感到自己為了種族或膚色，不公平地屈服於排外的制度下，心有不甘，因此，在國家內部引起分裂和仇恨。」（《民族發展》#63）

在通諭的總結部份，教宗保祿六世提出一個很重要的概念：**「發展」是和平的新名詞。換句話說，沒有發展，就沒有和平。**教宗不僅敦促全體基督徒（《民族發展》#82）及各地的社

會活動家（《民族發展》#83）積極為人類發展作出貢獻；他更熱切地向世界各地的執政者作出呼籲：「執政者，你們的責任是推動群眾，達到更有效的世界聯合，首先要他們接受必需的節制奢侈和浪費，以推進發展而保證和平；國際機構的代表們，在使人煥發的人類發展的友愛、和平、從公的合作中，是否也有危險而徒勞的武器競爭摻雜其間，這完全繫乎你們的努力了。」（《民族發展》#84）

在 1967 年《民族發展》通諭發佈時，世界普遍處於經濟起飛而以國民經濟收入（GNP）作為國家發展的指標，不少人們對通諭的態度是充滿懷疑的。但當人類經歷了二十世紀末及本世紀初短短二十年間的幾場嚴重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及國際關係矛盾時，重讀教宗的《民族發展》通諭時，才驚覺教宗保祿六世的先知眼光，而他的著作，在今日依然堪受推許為警世良言。

資料來源：

1. 香港教區檔案處，Section II Box 36, 「徐誠斌主教檔卷」 Folder 3
2. 《神學辭典》，1996，第 412 節教會史，p.555-556，鄒保祿撰。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編，台北，光啟出版社出版
3.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1987，《禮儀憲章》，中國主教團秘書處編譯，台北：天主教教務協。
4. 鄒保祿著，1983，《歷代教宗簡史》，台灣，聞道出版社。
5. 保祿六世，1967，《民族發展》通諭，沈鼎臣譯、天主教教務協進會譯，台北：鐸聲月刊社。
6. 林瑞琪，2018，「聖教宗保祿六世精於用人濟世無限」，刊於香港教區《公教報》，2018 年 9 月 17 日。
7. Wikipedia, 'Pope Paul VI', 2022-2-9.